

建立新人生观

建立新人生观，就是建立新的人生哲学。人生哲学在英文叫做“**Philosophy of Life**”，在德文则为“**Lebensanschauung**”，正是人生观的意义。他是对于生命的一种透视（**Insight**），也可说是对于整个人生的一种灼见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我们应该做怎样一种人？这些问题，我们今天不想到，明天不一定会想到；一个月之内不想到一次，一年之内不一定会想到一次。想到而不能解答，便是人生的大危机。若是永不想到的人，这真是醉生梦死，虚度一生的糊涂虫了。想到而要求适当的解决，那就非研究人生哲学不可。我们本是先有人生而后有人生哲学，正如先有饮食而后才有医学里的营养学。但是既有人生哲学以后，人生就免不了受他的影响。也只有了解人生哲学的人，对于人生才觉得更有意义，更有把握，更有前途。不但学社会科学的人应当了解，学自然科学的人也应当了解；广义的说，凡是做人的人都应该了解。普通种田的农夫，尚且根据传下来的经验，有所谓拇指律（**Rule of the thumb**），为一生做人的准则，何况知识与理性都已发展到高度的青年？

在现时代，人生哲学更有他重要的意义和使命。因为在这时代，旧道德标准都已动摇，而新的道德标准尚未确立，一般青年都觉得徬徨，都觉得迷惑，往往进退失据，而陷于烦闷与苦恼的深渊。在中国有此情形，在外国也是一样。外国从前靠宗教信仰维系人心。现在宗教信仰已经动摇，而新的信仰中心也未树立，在青黄不接的时代，更显出许多迷路的羔羊。读李勃曼

(Walter Lippmann) 《道德序言》(“Preface of Morals”)一书，知中外均有同感。因此在这个时代更有应重新估定生命的价值表，以建立新的人生哲学之必要；否则长久在烦闷苦恼之中，情绪日渐萎缩，意志日渐颓唐，生活自然也日渐低落。茅盾所著三部曲，一曰《动摇》二曰《追求》三曰《幻灭》。这三个名词，很足形容这时代青年心理的动向和惨态。现在旧的已经动摇了，大家拼命去追求新的，如果追求不到，其结果必归幻灭。幻灭是何等凄惨的事！有思想责任的人，对于这种为“生民立命”的工作，能够袖手旁观吗？

要建立新的人生哲学，首先要明白他与旧的人生哲学，在态度上至少有三种不同。有了不同的态度，才能对于新的生命价值表加以估定。

首先要认定的是新的人生哲学不是专讲“应该”(Ought)，而是要讲“不行”(Cannot)。旧的人生哲学常以为一切道德的标准，都是先天的范畴，人生只应该填塞进去。新的人生哲学则不持先天范畴之说，而只认为这是事实的需要，经验的结晶。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较空，成不成，要得要不得的问题更切。譬如拿文法的定律来说，本不是先有文法而后有文字，文法只是从文字归纳出来的。文法的定律并不要逼人去遵守他，但是你不遵守他，你就不能表白意思，使人了解。你自己用文字来达意表情目的，竟由你自己打消。所以这是不成的，就是要不得的，也就是所谓“不行”的。

其次新的人生哲学不专恃权威(Authority)或传统(Tradition)，乃要以理智来审察现实的要求和生存的条件。权威和传统并不是都要不得，只是不必盲目的全部接受。我们要以理智和经验去审察他，看他合于现代生命的愿望，目的，以及求生的动态与否。这不是抹煞旧的，而是要重新审定旧的，解释旧的。旧的是历史，历史是潜伏在每人的生命细胞之内，不但不

能抹煞，而且想丢也是丢不掉的；但是生命之流前进了，每个时间的阶段都有他的特质。镕铸过去，使他成为活动的过去，为新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才能适合并提高现实生存的要求。

还有一层，新的人生哲学不专讲良心良知，而讲整个人生及其性格风度的养成，并从经历和习惯中树立其理想的生活。他不和旧的一样，专从良心良知中去求判别是非的标准，以“明心见性”去达到佛家所谓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”的地步。他更不是建筑在个人的幻想，冲动，或欲望上面。他要从民族人类的历史中，寻出人与人的关系，以决定个人所应该养成的性格和风度。他是要从个人高尚生命的实现中，去增进整个的社会生活与人类幸福。觉得如此，方不落空。

新的人生哲学根据这三种的态度以重定生命的价值表，以建立新的人生观。他并不否认旧的一切价值，乃是加以必要的改变而已。他把旧的价值，重新估计以后，成为新的价值标准，以求人生的实现，更丰富和美满的实现。这才是真正“价值的转格”(“die Unwertung aller Werte”)。

我们不只是要求人生更丰富更美满的实现，我们还要把人生提高。平庸的生活，是不值得活的。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生力，朝着我们的理想，不但使我们的生命格外的崇高伟大，庄严壮丽，而且要以我们的生命来领导，带起一般的人，使他们的生命也格外的崇高伟大，庄严壮丽，所以我们要根据新的人生哲学态度，建立三种新的人生观：

第一是动的人生观 宇宙是动的，是进行不息的；人生是宇宙的一部分，所以也是动的，进行不息的。希腊哲学家海瑞克莱图斯(Heracleitus)说：“你不能两次站在同一个河里。”孔子在川上说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都是这个道理。何况近代物理学家更告诉我们电子无时无刻不在震荡的道理。人生在宇宙中间，还能够停止，不运用自己的生力去适应宇宙的动

吗？不能如此，便是“贼天之性”。何况人群的竞争，异常剧烈，你不动，他人动，你就落伍。落伍是生命的悲剧。中国受宋儒“主静主敬”学说的流毒太深了。这种学说里面，本来含着一部分印度佛教的成分，是与孔、墨力行的宗旨违背的。我们要把静的人生观摔得粉碎，重新建立动的人生观来。

第二是创造的人生观 我所谓动，不是盲动，是有目的的动，有意识的动。是前进的动，不是后退的动。这就是我们创造性的发挥。我们不只是凭自力创造，而且要运用自力，以发动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来创造。譬如宇宙间无穷的电力，我们以智慧来驱使他发光发热，供一切人生的需要，这个就叫创造的智慧。人类之有今日，是历代先哲创造的智慧所积成的。我们不能发挥创造的智慧，不但对不起自己的人生，而且对不起先哲心血积成的遗留。保守成功吗？保守就是消耗，衰落，停滞，腐烂与毁灭。又如前代的美术创造品，是有伟大的，特出的。设如你不把他吸收孕育到自己的创造的智慧里去，再来努力创造，而专门宝藏旧的，那不但旧的不能成为新人生的一部分，（我们至多不过享受而已，）而且新的伟大的美术作品永远不会出来。保守的方法无论如何好，旧的因为时间的剥蚀，总有销毁的一天。纵不销毁，那伟大的创作，终久是前人的创作，前时代的创作，有限的创作，而不是本人的创作，现时代的创作，无限的创作。我们不但要“继往”，更加要“开来”！

第三是大我的人生观 我们不要看得人生太小了，太窄了。太小太窄的人生是发挥不出来的。他一定像没有雨露的花苞，不但开不出来，而且一定萎落，一定僵死。我们所以有现在，是多少人的汗血心血培成的。就物质而言，则我们吃的穿的走的住的，哪一件不是农夫工人商人工程师发明家这一般广大的人群所贡献。就精神的粮食而言，哪一项伟大崇高的哲学思想，美丽谐和的音乐美术，心动神移的文学作品，透辟忠诚的

历史纪载，凡是涵煦覆育着我们心灵生活的，不是哲人杰士的遗留。我们负于大社会的债务太多了。只有藉他们方能充实形成小我。反过来也只有极力发挥小我，扩充小我。才能实现大我。为小我而生存，这生存太无光辉，太无兴趣，太无意识。必须小我与大我合而为一，才能领会到生存的意义。必须将小我来提高大我，推进大我，人群才能向上，不然小我也不过是洪流巨浸中的一个小小水泡，还有什么价值？这就是大我人生观的真义！

人生观不是空悬，是要藉生活来实现的。不是身体力行，断不能领会这种人生观的意味，维持他的崇高。所以要实现这三个基本的人生观，必要靠以下三种的生活方式。

第一是力的生活 宇宙没有力如何存在？人生没有力如何生存？萎靡柔懦是人生的大敌。力是生机的表现，是自强不息的活动，是一种向上的欲望。你愿意人叫你软骨动物吗？做人不但要有物质的力，而且要有精神的力。不但行为要有力，而且思想也要有力。有力方才站得住，行得开。科学的好处就在不但能利用自己的力，而且能利用宇宙的力。我们对宇宙的力要能储蓄待用，对自己的力也要储蓄待用。不要輕易的发泄，还要留作伟大的发挥。我们不要忘了，生命就是不断向上向外向前的努力。

第二是意志的生活 在这沉迷沦陷于物质生活的人群中，有几人能实行意志的生活，能领会这种生活的乐趣？不说超人，恐怕要等那特立独行的人罢！非是坚苦卓绝的人，怎配过意志的生活？因为这生活不是肉感的，不是享受的，生命的扩大，哪能不受障碍，障碍就是意志的试验。意志薄弱的见了困难就逃了，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运用“力”征服过去。经过痛苦是常事。只有痛苦以后得的甜蜜，才是真有兴趣的甜蜜。但是平庸的人能了解吗？意志坚强的人，绝对不怕毁灭，而且自

己能够毁灭，毁灭以后，自己更能有伟大的创造，所以战争是意志的试金石。我常论战争说，开战以前计较的是利害的轻重，开战以后计较的是意志的强弱。这就是胜负的关键！不但是有形的军队战争如此，一切生存战争，也是如此。平庸的，退却的，失败的锁链，只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扭开。

第三是强者的生活 能凭藉意志去运用力量以征服困难的生活。非强者的生活而何？我所谓强，是强而不暴的强，是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强。强的对面是弱。摇尾乞怜，自己认为不行，便是弱者的象征。强者的象征就是能在危险中过生活。他不但怕危险，而且乐于接受危险。他知道战争是不能躲避的，所以欢乐的高歌而上战场。他的道德信条是强健，勇猛，无畏，正直，威严，心胸广大，精神奋发。他最鄙视的是软弱，柔靡，恐惧，倚赖，狭小，欺骗，无耻。他因为乐于危险的生活，所以他不求安全。古人说：“磐石之安”，但是磐石不是有生命的。无生命的生活，过一万年有什么意思？况且求安全是不可能的事。安全由于平衡，生命哪有固定的平衡，因为你发展，人家也发展，只有以你自己的发展，来均衡人家的发展，才能得比较的安全。能够如此，才能操之在我。所以他永远是主人，不是奴隶。

我上面说过这三种生活，都是要靠身体力行的。前人说：“书生误国总空谈”，空谈不但误国，也是误己。坐谈何如起行！生命是进取的，不是等候的。生命是挟着时间前进的，时间哪容等候？柏格森说得对：“对于一个有意识的生命，生就是变，变就是成熟，成熟就是不断的创造自己。”所以我们要赶着每一个变动，增加自己生存的力量。

要创造一个新的生命，新的秩序，必须先创造一个新的风气，这就要靠开风气之先和转移一世风气的人。社会的演进，本不是靠多数沉溺于现在的湮溺的人去振拔的，而是靠少

数特立独行出类拔萃的人去超度的。后一种的人对于这种遗大投艰的工作，不只是要用思想去领导，而且要以实行的榜样去领导。看遍历史，都是这样，所以孔、墨都是力行的先哲。明季的颜习斋、李恕谷一般人更主张极端的力行。就拿近代的曾国藩来说，他帮清廷来平太平天国，我们并不赞成；但是当吏偷民情，政治社会腐败达于极点的时候，能转移一时风气，化乱世而致小康，实在有人所难能的地方。他批评当时的吏治是“大率以畏葸为慎，以萎靡为恭。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，曰畏缩，曰琐屑；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，曰敷衍，曰颟顸”。所以当时到了“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”的局面。他论当时的军事，引郑公子突的话，说是“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，轻而不整，贪而不亲”。他感慨当时的世道人心是“无兵不足深忧，无饷不足痛哭，唯求一攘利不先，赴义恐后，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……殊堪浩叹。”他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，以为是一个很谨愿的人，反之他是一个很聪明而很有才气的人，不过他硬把他的聪明才气内敛，成为一种坚韧的毅力，而表面看过去像是一个忠厚长者。他凭藉罗泽南在湖南讲学的一个底子，又凭自己躬行实践号召的力量，结合一班湖南的书生，居然能转移风气，克定大难，为满清延长了几十年生命。（他转移军队风气的一个例，很值得注意。他不是说当时军队“败不相救”吗？他以“千里相救”为湘军“家法”，所以常常打胜仗。）一个曾国藩在专制政体的旧观念之下，还能以躬行实践，号召一时，何况我们具有新的哲学深信，当着这国家民族生存战争的重大关头？

在这伟大的时代，也是颠簸最剧烈的时代，确定新的人生观，实现新的生活方式，是最迫切而重要的事。方东美先生说：“中国先哲遭遇民族的大难，总是要发挥伟大深厚的思想，培养溥博沉雄的情绪，促我们振作精神，努力提高品德，他们抵死推敲生命意义，确定生命价值，使我们脚跟站得住。”当拿破仑战

争时代，德国的哲学家菲希特（Fichte）讲学发表《告德意志民族》一书，也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有如孤舟在大海一样，虽然黑云四布，风浪掀天，船身摇动，船上的人衣服透湿，痛苦不堪，只要我们在舵楼上脚跟站稳，望着前面灯塔的光明，沉着的英勇的鼓着时代的巨轮前进，终能平安的扁舟稳渡。这一点小小的恶作剧，不过是大海航程中应有的风波！

道德的勇气

要建立新人生观，第一必须养成道德的勇气 (Moral courage)。道德的勇气是和通常所谓勇 (Bravery) 有区别的。通常所谓勇不免偏重体力的勇，或是血气的勇；而道德的勇气，乃是人生精神最好的表现。“匹夫之勇”与“好勇斗狠”的勇，哪能相提并论？

什么是道德的勇气？要知道什么是道德的勇气，就要先知道什么不是道德的勇气。第一，冲动不属于道德的勇气。冲动的行为是感情的，不是理智的；是一时的，不是持久的。他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，审慎的计划，所以不免“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”。他的表现是暴烈 (Violence)，暴烈是与坚毅 (Tenacity) 成反比例的。暴烈愈甚，坚毅愈差。细察社会运动的现象，历历不爽。第二，虚矫也不属于道德的勇气。虚矫的人，决不能成大事。所谓“举足高，心不固矣”。我们所要的不是这一套，我们所要的是“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”。对事非经实在考虑以后，决不轻易接受，而一经接受，就要咬紧牙根，以全力干到底。他所有的勇气，都是经内心锻炼过的力量，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现出来的。举一例来说明罢。我有一次在美国费勒得菲亚 (Philadelphia) 城，看一出英国文学家君格瓦特 (John Drinkwater) 的历史名剧，叫做《林肯》(“Abraham Lincoln”)。当林肯被共和党推为候选大总统的时候，该党代表团来见他，并且说明因为民主党内部的分裂，共和党的候选人是一定当选的。他听到这个消息，沉默半晌，方才答应。等代表团

走了以后，他又一声不响的凝视壁上挂的一幅美国地图。看了许久，他严肃地独自跪在地图前面祈祷。我看完以后，非常感动，回到寄住的人家里，半夜不能睡觉。心里想假如一般中国人听到自己能当选为大总统的消息，岂不要眉飞色舞，立刻去请客开跳舞会吗？中国名剧《牡丹亭》中，写一位教书先生陈最良科举中了，口里念道：“先师孔夫子，犹未见周王，老夫陈最良，得见圣天子，岂偶然哉！岂偶然哉！”于是高兴得满地打滚。但是林肯知道可以当选为大总统的时候，就感觉到国家重大的责任落在他双肩上了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不是一件可快乐的事。凝视国家的地图，继之以跪下来祈祷。这是何等相反的写照！

道德的勇气是要经过长期锻炼才会养成的。但是要养成道德的勇气，必定要有两个先决条件：第一是天性的敦厚，第二是体魄的雄健。就第一个条件说，一个人有无作为，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。不要说看人能否担当国家大事，就是我们结交朋友，也要先认定他天性是敦厚还是凉薄，才可以判断他能不能共患难。凡对自己的亲属都刻薄寡恩的人，是决不会对于朋友笃厚忠诚的。自然这样的人，也决不会对于国家特别维护，特别爱戴的。所以古来许多大政治家用人的标准，是宁取笨重，而不取小巧。倒是乡间的农夫，看来虽似愚笨，却很淳朴诚恳，到患难的时候讲朋友。只有那戴尖顶小帽，口齿伶俐，举动漂亮的人，虽然一时讨人欢喜，却除了做“小官僚”，做“洋行小鬼”而外，别无可靠之处。就第二个条件说，则体力与胆量关系，实在密切极了。二者之间，系数极大。体力好的人不一定胆子大；体力差的人，却常常易于胆子小。一遇危难，仓皇失措，往往是体力虚弱，不能支持的结果。《左传》形容郑国的小驷上阵，是“张脉兴奋，阴血周作，进退不可，周旋不能”，所以把战事弄糟了，骑在上面的国王，也就误在这马的身上。马犹如

此，人岂不然。我相信胆子是可以练得大的，但是体魄是胆子的基本。担当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他了吗？

具备这两个先决条件，然后才可以谈到如何修养道德的勇气。修养就是把原来的质素加以有意识的锻炼。孟子所谓“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劳其心志，苦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困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”，正是对于修养工作最好的说明。从这种修养锻炼之中，才可以养成一种至大至刚的“浩然之气”，一种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沮，黄河决于侧而神不惊”的从容态度；修养到了这个地步，道德的勇气才可以说是完成。但是有什么具体的办法，来从事于这种修养呢？

（一）知识的陶熔 真正道德的勇气，是从知识里面产生出来的，因为经过知识的磨炼而产生的道德的勇气，才是有意识的，而不是专恃直觉的。固然“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”，但这还是指本性的，直觉的方面而言。在现代人事复杂的社会里，一定要经过知识的陶熔，才能真正辨别是非，才能树立“知识的深信”(Intellectual conviction)。知识的深信，是一切勇气的来源，唯有经过严格知识的训练的人，才能发为有系统，有计划，有远见的行动。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盘，只是他把算盘看透了！

（二）生活的素养 仅有知识的陶熔还不够，必须更有生活的素养。西洋哲学家把简单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(“Simple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”)联在一起说，实在很有道理。没有简单的生活，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发挥的。社会上有些坏人，并不是他们自己甘心要坏的，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标准，一时降不下来，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亏。那占有欲(Possessive instinct)的作祟，更是一个重大原因。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时候，有两个大臣相约殉国。两个人说好了，一个正要辞别回家，这位主人送客出门，客还没有走，就问自己的佣人喂了猪没有。那位客人听了，就长叹一声，断定他这位朋友不会殉国。

他的理由是世间岂有猪都舍不得而肯自己殉国之理。后来果然如此。中国还有一个故事，说一个贪官死去，阎王审问他的时候说：“你太贪了，来生罚你变狗。”他求阎王道：“求阎王罚我变母狗，不要变公狗。”阎王说：“你这人真没有出息，罚你变狗你还要变母狗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他说：“我是读过《礼记》的。

《礼记》上说：‘临财母狗得，临难母狗免，所以我要变母狗。’”原来他把原文的“毋苟”二字读“母狗”，以为既可得财，又可免难。这虽是一个笑话，却是对于“心有所蔽”而不能抑制占有欲者一个最好形容。须知一个人的行动，必须心无所蔽，然后在最后关头，方可发挥他的伟大。这种伟大就是得之于平日生活修养之中的。

（三）意志的锻炼 普通的生活是感觉的生活（Life of senses），是属于声色香味的生活，而不是意志的生活（Life of will）意志的生活，是另一种境界，只有特立独行的人才能过得了的。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，坚韧不拔的操行，所以“举世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毁之而不加沮”。他有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气概，所以悠悠之口，不足以动摇他的信念。他能以最大的决心，去贯彻他的主张。他是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；他不但“不挟长，不挟贵”，而在这个年头，更能不挟群众，而且也不为群众所挟。他是坚强的，不是脆弱的。所以他的遭境愈困难，而他的精神愈奋发，意志愈坚强，体力愈充盈，生活愈紧张。凡是脆弱的人，最后都是要失败的。辛亥革命的时候，《民立报》的一位编辑徐血儿，以二十岁左右的青年，做了《七血篇》，慷慨激昂，风动一时。等到二次革命失败，他便以为天下事不可为了，终日花天酒地，吐血而死，成为真正的“血儿”。这就是意志薄弱，缺乏修养的结果。至于曾国藩一生却是一个坚强意志的表现。他辛辛苦苦，接连干了十几年。虽然最初因军事败衄要自杀两次，但是他后来知道困难是不可避免

的，唯有以坚强的意志去征服困难，才有办法，所以决不灰心，继续干下去。等到他做到了“韧”的功夫，他才“有成就”。

（四）临危的训练 一个伟大的领袖和他的伟大的人格，只有到临危的时候，才容易表现出来。世界上哪一个伟大的人物，不是经过多少的危险困难，不为所屈，而后能够产生的？俗语说：“老和尚成佛，要千修百炼”。修炼的时候，是很苦的。时而水火，时而刀兵，时而美女，一件一件的来逼迫他，引诱他。要他不为所屈，不为所动，而后可以成佛。这种传说，很可以形容一个伟大人物的产生。从前全国人对于委员长蒋先生还不能有深刻的认识，等到西安事变发生，他在极度危险的环境当中，依然保持他的尊严与气度，然后大家才都能真正认识他，信仰他，崇拜他。甚至连反对他的人也受了感动，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了。因为在这样九死一生的危险时机，他的伟大的人格和精神，都充分的表现出来。中国人常说：“慷慨成仁易，从容就义难。”张睢阳临刑前说：“南八，男儿死耳，不为不义屈。”这种临危的精神，是不因为他死而毁灭的。黄黎洲先生在他的补《历代史表序》上有一段文章说：“元之亡也，危素趋报恩寺，将入井中。僧大梓云，‘国史非公莫知，公死是死国之史也。’素是以不死。后修元史，不闻素有一词之赞。及明之亡，朝之任史事者众矣，顾独藉一万季野以留之，不亦可慨也夫！”这段沉痛的文字，岂仅指危素而言，也同时是为钱谦益辈而发。要知不能临危不变的人，必定是怯者，是懦夫。只有强者才不怕危险，不但怕危险，而且爱危险，因为在危险当中，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发挥。

中国历史上，有不少伟大的人物，如文天祥，史可法等，是可以积极表现道德的勇敢的。十年以前，我和蒋先生闲谈。我说，我们在开国的时候，何必多提倡亡国成仁的人物，和文天祥史可法诸位呢？蒋先生沉默了一会，他说：“文天祥不可以成败

论，其百折不回，从容就义的精神，真是伟大！”我想文天祥的人格，行为，及其留下的教训，现在很有重新认识的必要。他最初不见用于乱世，等到大局不可收拾的时候，才带新兵二万入卫。元朝伯颜丞相兵薄临安，宋朝又逼他做使臣去“讲解”。他以抗争不屈而被拘留。他的随从义士杜浒等设计使他逃出，准备在真州起两淮之兵，又遭心怀疑贰的骄兵悍将所扼，几乎性命不保，逃至扬州，旋逃通州。路遇伏兵，饥饿得不能走了；杜浒等募两个樵夫，把他装在挑土的竹篮中抬出。航海到温州起兵；转到汀州、漳州，经广东梅州而进兵规复江西。汉奸吴浚来说降他，他把吴浚杀了。江西的会昌、零都、兴国、抚州、吉安，和庐陵的东固镇都有他的战绩。他的声势，一度振于赣北和鄂南。兵败了，妻子都失陷了，他又重新逃回到汀州，再在闽粤之间起兵；又由海丰，南钹打出来，在五坡岭被执。自杀不死，路过庐陵家乡绝食不死；解到燕京，元人起初待以上宾之礼，说降他，以丞相的地位引诱他，他总是不屈，要求元朝杀他。若是不杀他，他逃出来，还是要起兵的。元朝也为这个理由，把他杀了。他在狱中除作了《正气歌》之外，还集杜诗二百首，这是何等的镇静！何等的从容！他就刑时候的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！”几句话，不独留下千秋万世的光芒，也是他一生修养成功的“道德的勇气”的充分表现。他本来生活是很豪华的，经国难举兵以后，一变其生活的故态。他的行为，有两件特别可注意的事。第一是他常是打败仗而决不灰心。当然他是文人，兵又是乌合之众的义兵，打败仗是意想得到的。但是常打胜仗，间有失败而不灰心还容易；常打败仗而还不灰心，实在更困难。这是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精神。第二是他常逃，他逃了好几次；但是他逃了不是去偷生苟活，他逃了还是去举兵抗战的。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，是表现什么一种勇气？做事只要是对

的，成败有什么关系？“若夫成功则天也”，也是他最后引以自慰的一句话。文天祥出来太晚了！文天祥太少了！若是当时人人都能如此，元朝岂能亡宋？所以文天祥不但是志士仁人，而且是民族对外抗战的模范人物！

必须有准备殉国成仁的精神，才能做建国开基的事业！进一步说，若是真有准备殉国成仁的精神，一定能完成建国开基的事业！

“时穷节乃见，一一垂丹青！”

知识的责任

要建立新人生观，除了养成道德的勇气而外，还要能负起知识的责任 (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)。本来责任是人人都有，无论是耕田的，做工的，从军的，或者是任政府官吏的，都各有各的责任。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“知识的责任”来讲？知识是人类最高智慧发展的结晶，是人类经验中最可珍贵的宝藏，不是人人都能取得，都能具备的；因此凡有求得知识机会的人，都可说是得天独厚，享受人间特惠的人，所以都应该负一种特殊的责任。而且知识是精神生活的要素，是指挥物质生活的原动力，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。倘使有知识的人不能负起他特殊的责任，那他的知识就是无用的，不但无用，并且受了糟蹋。糟蹋知识是人间的罪恶；因为这是阻碍或停滞人类文化的发达和进步。所以知识的责任问题，值得我们加以严重的注意。我们忝属于所谓知识分子，尤其觉得这是一个切身问题。

所谓知识的责任，包含三层意义：

第一是要有负责的思想。思想不是空想，不是幻想，不是梦想，而是搜集各种事实的根据，加以严格逻辑的审核，而后构成的一种有周密系统的精神结晶。所以一知半解，不足以称为成熟的思想；强不知以为知，更不能称为成熟的思想。思想是不容易成立的；必须要经过逻辑的陶熔，科学的锻炼。凡是思想家，都是不断的劳苦工作者。“焚膏油以继晷，恒矻矻以穷年”，他的求知的活动，是一刻不停的，所以他才能孕育出伟大成熟的思想，以领导一世的思想。思想家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

斗出来的。他们为求真理而蒙受的牺牲，决不亚于在战场上鏖战的牺牲。拿科学的实验来说，譬如在实验室里试验炸药的人，被炸伤或炸死者，不知多少。又如到荒僻的地方调查地质，生物，人种的人，或遇天灾而死，或染疾而死，或遭盗匪蛮族杀害而死的，也不知多少。他们从这种艰苦危难之中得来的思想，自然更觉得亲切而可以负责。西洋学者发表一篇学术报告或论文，都要自己签字，这正是负责的表现。

其次是除有负责的思想而外，还要能对负责的思想去负责。思想既是不易得到的真理，则一旦得到以后，就应该负一种推进和扩充的责任。真理是不应埋没的，是要发表的。在发表以前，固应首先考虑他是不是真理，可不可以发表；但是既已考虑发表以后，苟无新事实新理论的发现和修正，或是为他人更精辟的学说所折服，那就应当本着大无畏的精神把他更尖锐地推进，更广大地扩充。我们读西洋科学史，都知道科学家为真理的推进和扩充而奋斗牺牲的事迹，真是“史不绝书”。譬如哥白尼(Copernicus)最先发现地动学说，说太阳是不动的，地球及其他行星都在他的周围运行，他就因此受了教会多少的阻碍。后来白兰罗(Bruno)出来继续研究，承认了这个真理，极力传播，弄到触犯了教会的大怒，不仅是被捕入狱，而且被“点天灯”而死。盖律雷(Galileo)继起，更加以物理学的证明，去阐扬这种学说，到老年还铁锁银铛，饱受铁窗的风味。他们虽受尽压迫和困辱，但始终都坚持原来的信仰，有“鼎镬甘始饴，求之不可得”的态度。他们虽因此而牺牲，但是科学上的真理，却因为他们的牺牲而确定。像这种对于思想负责的精神，才正是推动人类文化的伟大动力。

再进一层说，知识分子既然得天独厚，受了人间的特惠，就应该对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群，负起更重大的责任来。世间亦唯有知识分子才有机会去发掘人类文化的宝藏，才有特权去承受